

每部翻拍片都是一次跨文化转译的考验

——从电影《门锁》说开去

刘春

观点提要

翻拍片如何令喜欢原作的观众重温经典并感到新意,如何令不了解原作的观众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达,都是考验编导跨文化“转译”功力的关键。

本土化转译,既要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惯、价值归属,也要考虑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受众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审美期待等综合因素,需要努力为翻拍片提供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而非简单粗暴不顾文化语境的单纯移植。

翻拍自韩国同名电影的影片《门锁》,上映之后未能在主题内容深入剖析、视听手法艺术创新等方面赢得观众的普遍认可。一些影迷对比后甚至认为影片总体不及韩版原作。

有意思的是,韩版《门锁》本身也是翻拍自2011年上映的西班牙影片《当你熟睡》。男主角是一个见不得别人快乐的重度心理疾病患者,其利用大楼保安保管备用钥匙的职务之便暗中破坏他人幸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欧洲人文反色色彩。韩版翻拍片保留了男主潜藏在受害女主床下,待其熟睡迷晕她又在清晨悄然离开的主要桥段,叙述重点从西班牙版的施害者变为被欺凌的受害女性。从内容上看,新片《门锁》的故事结构更接近韩版,同时反派男主的人设又带有西班牙版的人格分裂和歇斯底里,但最终在主题浮于表面、人物工具化、叙述混乱、情节缺乏现实逻辑等编导对于影片的失控中,口碑持续下滑。

近年来,同样遭遇“滑铁卢”的国产翻拍片不在少数,“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已然成为跨文化语境中大多数翻拍电影的微妙写照。

在优秀剧本缺乏的当下,翻拍别国影片不失为电影运作的稳妥做法

套用原作已得到市场检验大受欢迎的成熟故事结构,经过本土化改编和更具亲和力的本土明星演绎,不仅缩小了原创剧本的开发成本,甚至还可能利用原作热度减少宣发成本,以“先天优势”吸引观众。在本土电影优秀剧本缺乏的当下,购买海外中小成本高票房影片进行二次翻拍,似乎不失为电影运作的稳妥做法。

以美国好莱坞为参照,多家影业巨头都深谙此道,《龙纹身的女孩》《生人勿进》《触不到的恋人》《咒怨》等翻拍影片都取得了成功,马丁·斯科塞斯翻拍自《无间道》的《无间道风云》,更新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大奖。好莱坞的翻拍电影,大多保留原作基本故事架构,删改带有鲜明异域文化特质的民俗细节,调整人物关系和表达手段,加入符合欧美观众文化背景的价值观,正如《滚石》评价《无间道风云》是一部完全美国化的影片,好莱坞的成功翻拍电影都较完整地完成了影片的本土化

改编。但即便有着成熟的工业制作体系打底,好莱坞也还出品了《歌舞青春》《午夜凶铃》《不请自来》等评分并不高的翻拍电影。

事实上,做好跨文化的影片改编并不容易,原作口碑红利恰似“双刃剑”,拉高影片预期的同时也会隐藏不少“雷区”。一方面,翻拍片不等于对原作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抄”或“翻译”。《麻烦家族》《深夜食堂》《我知女人心》《捉迷藏》等翻拍片就吃亏在缺乏创新、过于依赖原作,剧情不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内容生搬硬套,最终形成不被认可的“夹生饭”;另一方面,原作珠玉在前,翻拍片过多或不恰当的魔改,又会被影迷认为不符合原作设定,白白浪费了好IP,如《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新娘大作战》《命中注定》《解忧杂货铺》等影片,均在改编中遗失了原作精髓沦为平庸之作。此外,习惯观看海外片的观众并不必然等同于为翻拍片买单的观众,如何令喜欢原作的观众重温经典并感到新意,如何令不了解原作的观众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达,都是考验编导跨文化“转译”功力的关键。一旦处理不好改编过程中的保留和删改难题,就会形成翻拍就翻车、买家秀不及卖家秀的“山寨”作品。

某种意义上,各个国家的翻拍电影都像参与了一场依托原作影片的“命途”大赛。例如,意大利影片《完美陌生人》就卖出了三十多个国家的改编权,国内有学者专做论文对比过希腊、西班牙、土耳其、韩国、匈牙利、波兰和中国等多个版本的翻拍片。在这场思想、艺术、技术的跨文化改编比拼里,中国版《来电狂响》的翻拍只能说无功不过,影片中中规中矩的叙事难以支撑过多的相关社会议题,引发的观众共鸣不及原作隽永悠长。

优秀的翻拍片,能够同时满足观众对于类型本身和原作创新的双重期待

当前国产商业类型电影翻拍对象以美国、韩国和日本电影数量最多,考虑到好莱坞影片公认的工业标准和全球影响,以及日、韩影片相对亲近的地缘文化,这样的选择似乎很合理。然而《小小的愿望》《人潮汹涌》《保持通话》《追捕》等翻拍片与原作相比始终差一口气,这就不得不探究商业类型电影翻拍的关键



►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影片《误杀》,将故事场景放在泰国,加入对《监狱风云》《肖申克的救赎》等影片的戏仿,引导观众跟随主角展开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头脑风暴,不仅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而且形成了新的IP,将于今年贺岁档推出第二部。图为《误杀2》剧照

◀电影《门锁》跟随女主的“他者”视角和恐怖片惯用的心理暗示音乐,营造出独居女性时刻可能遭遇危险的可怕境遇,而这究竟是女性的臆想、自我暗示还是具有深刻的现实缘由?电影并未对此深究,转而寻找幕后凶手。影片最终落得所有问题都没讲透的“四不像”。图为《门锁》剧照

到底是什么。

类型电影之所以经久不衰,核心就在于每种类型都在视听奇观中蕴含了一种对于人类文明根本问题类似“永恒追问”的迷思,如两性关系之于爱情片、科技焦虑之于科幻片、正义自由之于黑帮片等。类型电影自诞生以来,善于不断自我更新,吸收不同时代、地域的文化特征,对其核心“母题”做出调整,从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相似主题趋之若鹜。

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改编的商业类型电影首先需要满足“类型”的要素要求,如基本的故事架构、人物塑造等都要包含该类型的叙述元素。优秀的翻拍电影,需要满足观众对于类型本身和原作创新的双重期待,当我们观看一部爱情喜剧翻拍电影时,不会预期这是一部恐怖奇幻警匪片,同时还期待看到原作中备受喜爱的故事被重新演绎后再次唤起心灵的慰藉。虽然融合不同类型特征使影片更加丰富多元,也是近年来商业类型电影吸引不同观众的有效手段之一,但融合仍需以某一类型为主才能

主题明确、有的放矢,例如翻拍自《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的《西虹市首富》,固然不乏爱情、悬念,最终还是以密集的笑料荣登年度卖座喜剧片榜单。反观新片《门锁》,跟随女主的“他者”视角和恐怖片惯用的心理暗示音乐,营造出独居女性时刻可能遭遇危险的可怕境遇,而这究竟是女性的臆想、自我暗示还是具有深刻的现实缘由?电影并未对此深究,转而寻找幕后凶手。通篇游离于剧情、恐怖、悬疑、犯罪等不同类型要素之间,影片最终落得所有问题都没讲透的“四不像”。

翻拍片不单是回应市场热点的商业运作,更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载体

在满足“类型”层面基本要素,也就是点出影片“母题”,对该类型所蕴含的人类共通问题做出回应后,翻拍片更需要完成跨文化的故事转译。原作影片在跨文化传播中,观众就很容易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形成对影片的“误读”或理解障碍、主题偏差,翻拍片则更可能遭遇“文化壁垒”“文化折扣”带来的冲击。本土化转译,既要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惯、价值归属,也要考虑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受众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审美期待等综合因素,需要努力为翻拍片提供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而非简单粗暴不顾文化语境的单纯移植。

当前国产翻拍电影佳作少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重“形”不重“神”,乍一看故事模仿得很像,但在改编中既丧失了原作的深层主旨,又没有赋予影片更加本土化的精要,显得既没有“化用”好原作,又未尊重本土观众审美品位。

达到上述两方面标准的翻拍片基本不会“翻车”,而优秀的翻拍电影还会为影片增加多一点“调料”,即源于原作又高于原作的创意。类型元素和原作框架本身已基本限定了翻拍片的大致走向,要做到创新就只能在影片的“本土移植”方面下功夫。一种做法是紧贴原作,保留最核心的故事情节,其余内容全部换成更“接地气”的本土内容。如翻拍自

《十二怒汉》的影片《十二公民》就将原版中的美国司法公正、种族歧视、阶层差距等议题改为空巢老人、代沟矛盾等更贴近中国观众生活的主题;还有一种做法,也是保留基本故事情节,但有意模糊时空背景,重心并非让观众联系现实,而是沉浸在剧情推理中。如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影片《误杀》,就将故事场景放在泰国,加入对《监狱风云》《肖申克的救赎》等影片的戏仿,引导观众跟随主角展开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头脑风暴,不仅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而且形成了新的IP,将于今年贺岁档推出第二部。

正如学者乐黛云所言,当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误读,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不见”与“洞见”,面对文化差异,翻拍电影不单是回应市场热点的商业运作,更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载体。在全球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走心”又“接地气”的翻拍电影不失为一扇看见世界又让世界看见的文化之窗。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第三只眼”看文学

一次成功的“破圈转身”

——看范稳的《太阳转身》

潘凯雄

大约还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报有关脱贫攻坚主题出版的重点选题中就有范稳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随后这个选题又被中宣部列入“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老实说,对这个选题我当时心中并非特别有底。这当然不是对范稳创作能力的不信任,而是对他能否胜任这种类型的创作心里没底。范稳过往的长篇小说创作,重要的作品不是由以《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等三部长篇组成的“藏地三部曲”就是《重庆之眼》和《吾血吾土》,这些作品特色鲜明也堪称优秀,但所涉内容不是有关藏地的历史文化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要事件,而近距离的现实题材写作并不多见,更何况还是“脱贫攻坚”这个对小说创作而言确有某种挑战性的题材。

时间很快便转到了今年的3月中旬,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送来了这部《太阳转身》的打印稿,让我抓紧看。于是,我便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进入对这部作品的第一次通读,而卒读下来的基本判断有二:一这是我看过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中特别“小说化”的一部作品;二当然也还有明显不足。一周后,人文社邀请了包括本人在内的四位专业人士为之会诊,“坦率”是这次会诊的主旋律。对此,范稳除去问或笑眯眯地做点回应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点头或埋头(记录)。再往后三个多月,范稳妥妥

地交出了现在这篇。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盘这个过程,其用意无非想说一部好作品固然可能一气呵成,但有时候也是需要打磨的。

对这部作品的创作难度,以及为完成、而且要出色地完成这部作品的创作,范稳本人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已是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七部长篇小说”,但“过去我更倾向于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我的学习和表现对象,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这次我把目光转向了当下,转向了壮族。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范稳明白自己“需要去选种育苗,精耕细作,接上地气,吸取养分,在田里走一走,在大地上去发现”。为此,他深入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个“地处南国边陲,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战火纷飞、英雄辈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对外开放。因此它是云南贫困程度最深、面积最广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范稳“走访了数十个边境村寨,见证了偏远山乡的巨变,结识了许多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并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置身‘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中,是一种荣幸。我们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去呈现,就显得尤为重要”。没错,“如何去呈现”至关重要。

如果不了解上述过程而只是初看作品,视《太阳转身》为刑侦破案小说其

实也未尝不可。作品的一号主角全然不是常见脱贫攻坚题材中的村长或支书,也不是被组织安排到基层挂职扶贫的“第一书记”,而是从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刚刚退下来不久的老局长卓世民。而且这个“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视“波澜壮阔的人生是显英雄本色,可风平浪静的日子才是生活”的老刑警还享受几天“生活”的“日子”就因为自己腰腿上的“一个占位”成了“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作品的故事主体则是这个虽刚一退下来就给自己制定了“不插手局里工作,不掺和任何案件,不帮人说情”这“三不政策”的老刑侦,又不得不卷入对一件拐卖儿童案的重大侦破,直至自己在胜利曙光降临前壮烈牺牲的全过程。至于与脱贫攻坚相关的那个南山村恰巧正是与这桩刑侦案有重要关联的所在地,这个村从极贫到脱贫的全过程都是因此而穿插在整个破案过程中被自然带出,无论是村里脱贫而殚精竭虑的老村长曹前宽还是在极度贫困而迷失人生方向走上犯罪之路的曹前贵等皆无一例外。

不仅如此,《太阳转身》在这两条重要但并非平行的叙事线之外,还有不少颇有意味的设置也是十分精心与讲究。比如,将被拐儿童童依阳之母韦小香设计成壮族,且她的老乡包阿姨恰是在卓世民家服务多年的老保姆,而卓世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卓婉玉之研究方向正好又是壮族的族源和

迁徙,这一连串“巧合”不仅将卓世民看似偶然地“卷”入这场“奇案”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引入了壮族文化这一要素,于是,“找一把稻穗喊魂”、那个“令看客们只能想入非非的活动——裸浴”“开秧门”等壮族民俗以及意味深长的《祭祀太阳古歌》的进入都是十分自然的了。还有,作品开篇对卓世民退休生活的一段描写,诸如与老搭档高荣打打网球钓钓鱼、侍候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父亲、陪夫人肖玉做做饭之类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看似“闲笔”之笔其实都是作品中一些颇有寓意的点睛之笔,十分自然而贴切地厚植了作品的意味。

尽管看上去为辅,但《太阳转身》对“脱贫攻坚”的叙事设计同样颇为用心,这是作品另一条沉重的叙事主线。范稳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放在脱贫攻坚领头人曹前宽和因贫而“转身”误入歧途的曹前贵、杨翠华、赵四毛等人所在的南山村与杨家寨,而这里又恰是40年前那场南线战争中身为侦察连长的卓世民与支前民兵连长曹前宽结下生死情谊的地方,范稳以那场战争作为南山村这个古山寨脱贫攻坚一段荡气回肠的“前史”进行了足够的铺垫,这才进入“随着全国‘脱贫攻坚’的打响,边陲之地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这是一场丝毫不逊色于当年那场保卫边疆的战争。世代戍边的人们……不应该贫穷,不应该永远落后于时代”。于是,因

贫困而引发的两场当下“战争”在这里同时打响:一场是卓世民毅然告别原本安逸的生活,与长期志同道合的战友高荣来到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最终愿愿携手将依阳解救,卓世民更是在与歹徒的奋勇拼杀中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另一场则是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依建光和韦小香夫妇以及曹前贵、杨翠华、赵四毛等曾因贫穷一度“转身”误入贩卖人口的歧途;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老村长曹前宽对于修路的执着,他始终以愚公的毅力和精神要为南山村修建一条通向现代文明之路,这个曾是卓世民得力战友的生命中有着着一股永不打败的血性和韧劲。在他眼中:“对于那些生存条件险恶的村庄,像南山村这种被判了‘生态癌症’的村庄,再苦再难,我们也要像当年打仗一样,向贫困开战。”“生态癌症”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脱贫攻坚的干劲,缺少了为国成边的精神。”曹前宽的“修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浓缩着这片土地上脱贫攻坚战役的发展史:从村民个体的人挖肩扛到善良人的热心帮扶到党和政府一系列精准扶贫措施的落实到位,南山村的脱贫攻坚事业如火如荼地不断深入人心直至走向胜利,被拐儿童依阳成功获救、白血病患者林褚承得以医治、村民们开始致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华大地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一幅缩影?

回到本文开头不久即说到的“这是我看过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中特别‘小说化’了的一部作品”上来。本是长篇小说又何言“特别‘小说化’”?这就是相对于我所看到的另一些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言,这部分作品虽名为长篇小说,但整体上其实更像长篇非虚构写作,拘泥于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一看作品就大抵明白其原型是谁。这样的写作明显悖逆了长篇小说赖以立生最基本的特性,而且还由此形成了某种新的“圈套”,而误入这种“圈”中的长篇小说即使它的主题再突出也不可能有多少生命力可言。相比之下,《太阳转身》则是将脱贫攻坚纳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时代与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去表现、去书写。包括从一位迟暮的英雄警察被动地卷入一桩跨越千里的拐卖儿童案这样一段脱贫攻坚的“前史”切入,包括以壮族文化为作品某一局部的背景,包括40年前的那场南线之战等……这些看似与脱贫攻坚并行且相对独立的情节细节与场景,实际又都是和“贫”与“脱贫”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剪不断的直接与间接的历史与文化关联,也正是这些个因素合理而巧妙地植入不仅使得《太阳转身》的深度、厚度与意味得以大大强化,而且保证了《太阳转身》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称其为范稳“一次成功的‘破圈转身’”就是实至名归的了。